

# 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

陈氏镇

**【摘要】**新出安大简《仲尼曰》提供了一种新的先秦孔子语录辑本,可为认识孔子思想的内涵、孔子言论的流传以及《论语》《礼记》《孔丛子》诸书的形成提供重要线索。《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的摘编本,并经过摘编者的改编。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仲尼曰》的摘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偏好,如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慎独”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

**【关键词】**安大简;《仲尼曰》;《论语》;儒家

**【作者简介】**陈氏镇(1988-),男,浙江苍南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先秦史。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京),2022.4.58~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20&ZD265)的阶段性成果。

2022年8月19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正式发布,<sup>①</sup>该辑包含两种文献,分别是《仲尼曰》与《曹沫之陈》。《仲尼曰》是一种体例与《论语》近似的孔子语录,由13支完简组成,共收录孔子言论25则,其中有的条目与《论语》《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文献所记相合,还有的则不见于现存传世古书。原无篇题,因各条目多以“仲尼曰”引入,故整理者拟题为《仲尼曰》。在整理报告正式发布之前,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所撰《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对《仲尼曰》已有介绍,<sup>②</sup>在该文中,《仲尼曰》被称作《仲尼》。本文以正式整理报告为准,称之为《仲尼曰》。

《仲尼曰》至少有以下几点重要价值:其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论语》等传世古书的训释,如对“造次”“颠沛”的理解;<sup>③</sup>其二,有助于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观念,如对“慎独”及“劳”“役”关系、“心”“色”关系的理解;其三,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论语》的分章情况,如《论语·季氏》中的“见善如不及”节与“齐景公有马千驷”节,过去学者或分为二章,或合为一章,今据《仲

尼曰》,当是一章;<sup>④</sup>其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论语》《礼记》《孔丛子》等古书的形成与流传。本文试就《仲尼曰》的性质及编纂提出初步认识,以就正于方家。

## 一 《仲尼曰》的摘编性质与材料来源

《仲尼曰》共收录孔子言论25则,相当于《论语》中的25章。《仲尼曰》的内容或见于《论语》,或见于《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诸书,或不见于现存古书。以下在整理报告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示列《仲尼曰》的宽式释文及传世文献中的相应内容。

《仲尼曰》所记孔子言论体现出如下特点:其一,与《论语》存在交集,与《论语》相近者8则(占33%),其中见于《里仁》者2则,其他分别见于《卫灵公》《公冶长》《宪问》《雍也》《颜渊》《季氏》,但更多的则不见于今本《论语》;其二,孔子言论的具体表述与传世文献不尽相同,<sup>⑤</sup>不少较传世文献的相应记述简省;<sup>⑥</sup>其三,发言主体不尽相同,《仲尼曰》中某些被视作孔子言论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却被冠以曾子等发言主体。

《仲尼曰》	传世文献的相应内容
1. 仲尼曰：“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	曾子曰：“……夫华繁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大戴礼记·曾子疾病》） 曾子曰：“……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说苑·敬慎》）
2. 仲尼曰：“今 <sup>⑤</sup> 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礼记·缙衣》）
3. 仲尼曰：“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礼记·缙衣》） <sup>⑥</sup>
4. 仲尼曰：“去仁，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5. 仲尼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
6. 仲尼曰：“伊 <sup>⑦</sup> 諝=，而禹 <sup>⑧</sup> 諝=， <sup>⑦</sup> 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	
7. 仲尼曰：“君子所慎，必在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
8. 仲尼曰：“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	孔子曰：“……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9. 仲尼曰：“回，汝幸，汝有过，人不隐 <sup>⑨</sup> 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汝有过，人弗疾也。”	
10. 仲尼曰：“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为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礼记·大学》）
11. 仲尼曰：“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而不 <sup>⑩</sup> 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	
12. 仲尼曰：“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
13. 仲尼曰：“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14. 仲尼曰：“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	故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孔丛子·刑论》）
15. 仲尼曰：“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16. 仲尼曰：“喜怒不时，恒侮。”	
17. 仲尼曰：“管仲善，善哉！老吃。”	
18. 仲尼曰：“以同异难，以异易 <sup>⑪</sup> 。”	
19.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之未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闻？”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20. 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离娄下》）
21. 仲尼曰：“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及 <sup>⑫</sup> 。隐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 <sup>⑬</sup> 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掩，必夫人之谓乎？”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君子祸之为患，辱之为畏，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终身。（《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22. 仲尼曰：“小人乎！何以寿为？一日不能善。”	孔子曰：“小人何以寿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恶，恶之甚也。”（《中论·修本》）
23. 仲尼曰：“颠于沟岸 <sup>⑭</sup> ，吾所不果援者，唯心弗知而色为知之者乎？”	
24. 仲尼曰：“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 <sup>⑮</sup> 而伐功，虽劳不闻。”	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墨子·修身》）
25. 仲尼曰：“敝不敝，恒=侮人。”	
仲尼之嵩 <sup>⑯</sup> 也。仆快周恒。 <sup>⑰</sup>	

关于第一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根据《仲尼曰》与《论语》的交集指出,《仲尼曰》有可能是早期《论语》的一个摘抄本,《仲尼曰》源出的《论语》文本与今本《论语》有异,说明今本《论语》的篇章经后人增补删定。<sup>①</sup>黄德宽先生则指出,从收录条目分布和内容看,《仲尼曰》辑录的孔子言论三分之二以上不见于今本《论语》,见于《论语》的8条在文字上也有所不同,可见《仲尼曰》与今本《论语》虽有联系,但不大可能是《论语》的战国摘抄本。<sup>②</sup>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先秦《论语》写本,西汉写本则主要有定州汉简、海昏侯墓汉简以及朝鲜平壤贞柏洞汉墓竹简。这三种西汉写本虽在分篇、分章及用字上有一定差异,但基本内容与今本《论语》出入不大。可见,至迟在西汉,《论语》已有相对稳定的文本。《论语》文本的稳定性,说明它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大规模增删的可能性并不大。无论是《仲尼曰》还是《孔子曰》,其内容都溢出了今本《论语》,应是《论语》不同的孔子言论辑本。

关于第二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根据《仲尼曰》与《论语》的差异指出,《论语》有的内容明显经过后人润色修饰,<sup>③</sup>亦即《仲尼曰》的一些表述之所以更为简省,是因为更原始的缘故。有学者提出类似的想法,认为《仲尼曰》与今本《论语》在文字上的出入,大概是由于不同的学生在记载时详略不同造成的,属于同一来源(皆源自孔子之语)的两种文本,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仲尼曰》应当属于《论语》成书的前期材料。<sup>④</sup>《仲尼曰》与《论语》等古书的表述有出入,而往往更为简省,除了《仲尼曰》更原始、早于《论语》等古书的可能,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那便是《仲尼曰》是从其他古书摘录、改写而来。本文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关于第三点,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指出《仲尼曰》中有一些最早应是孔子的言论,被误认为是他人的言论。<sup>⑤</sup>可见,当《仲尼曰》与传世文献的发言主体存在矛盾时,整理者显然倾向于《仲尼曰》的说法,认为这些言论最初源自孔子,后来才被他人所借用。然而,《仲尼曰》中所谓仲尼之语,是否果真出自

孔子之口,实际上并非无可置疑。

一般认为,《论语》一书来自“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sup>⑥</sup>反映了最可靠的孔子思想。除了《论语》,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还记录了其他据称出自孔子的言论。这些孔子言论有的可能出自后人杜撰,有的则是孔门弟子“闻诸夫子”(《论语·子张》)的转述。《仲尼曰》中所记孔子语在传世文献中却出自曾子等人之口,自然也可能是孔门弟子“闻诸夫子”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所谓孔子言论与《论语》所见孔子思想并不相合,甚至不可能产生于孔子的时代,<sup>⑦</sup>此类言论的可靠性便值得怀疑。

《仲尼曰》所记孔子言论极为简质,这便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它更接近《论语》等古书的材料来源的原始形态,《论语》诸书应采用了类似于《仲尼曰》的材料;其二,《仲尼曰》的内容自其他文献摘抄、转录而来,同时对某些孔子言论加以简省。如果与《论语》所见孔子思想相比照,不难窥见《仲尼曰》摘编晚出儒家后学著述的蛛丝马迹。

首先是第2则。该条表述近于《礼记·缁衣》:

仲尼曰:“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诗》曰:‘彼求我,若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仲尼曰》)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礼记·缁衣》)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教此以失,民此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云:‘未见圣,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由圣。’”(郭店简及上博简《缁衣》,本文采用宽式释文)<sup>⑧</sup>

郭店简本与上博简本基本无别,唯用字有所差异。与《礼记·缁衣》相比,“教此以失,民此以烦”一句,“教”“民”的前后次序不同。总的来看,该章从战国竹书本到《礼记》本均无大的变动。《仲尼曰》与之相比,则存在较大差异。“大人”在《仲尼曰》中作“今

人”，“亲其所贤”在《仲尼曰》中作“信其所贤”，《仲尼曰》无“教此以失，民此以烦”一语，且未引用《君陈》。可见，战国竹书本及《礼记》本《缙衣》的表述均较《仲尼曰》繁复，那么究竟《仲尼曰》是《缙衣》的材料来源，抑或《仲尼曰》由《缙衣》省改而来呢？

《仲尼曰》及《缙衣》所引《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是重要的突破口。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论看，孔子虽强调《诗》的作用，但在对话中直接引《诗》的场合并不多。且在《论语》中，孔子引《诗》均为直接引用，<sup>⑤</sup>未称“《诗》云”“《诗》曰”或具体篇名。<sup>⑥</sup>而在孔子言论之后以“《诗》云”引入《诗》的句子作结的体例，正以《礼记》中《缙衣》《表記》《坊记》诸篇最为典型。这几篇的体例高度一致，南朝沈约认为均出自孔子之孙——子思的手笔。<sup>⑦</sup>《仲尼曰》第2则以“《诗》曰”作结，且在引文之后无进一步发挥，正是《缙衣》诸篇的体例。过去王夫之、陈澧、程元敏等人均认为《缙衣》诸篇所引《诗》《书》均非孔子原语，而是孔子后学所增饰。<sup>⑧</sup>虞万里先生与王夫之等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强调如此整齐地以《诗》《书》证理，是战国中晚期才有的风气，同时也指出《缙衣》所引《诗》《书》大部分是纂辑和传授者所增饰，但不排除少量或个别为孔子本人所引。<sup>⑨</sup>廖群女士的看法与此相近，她认为《缙衣》中“《诗》云”基本不是孔子原语，但不能完全否认有的可能是孔子所引，并强调引《诗》证说现象的强化始于《缙衣》。<sup>⑩</sup>虞万里先生与廖群女士的观点相对谨慎，末永高康先生则强调，《缙衣》各章语末引文为《缙衣》作者所加是毫无疑问的。<sup>⑪</sup>从《缙衣》全篇的体例和战国中晚期的风气看，《缙衣》中所引《诗》《书》后出的可能性无疑更大。果其如此，应是《仲尼曰》袭用了《缙衣》的语句，而非相反。若这一推断不误，那么《仲尼曰》的成篇应晚于《缙衣》。《缙衣》被不少学者视作子思的作品，子思的卒年有公元前400、<sup>⑫</sup>前402、<sup>⑬</sup>前406、<sup>⑭</sup>前413、<sup>⑮</sup>前413-403、<sup>⑯</sup>前412-405年<sup>⑰</sup>诸说，假定《缙衣》在子思身后得到广泛传播，《仲尼曰》的成篇亦可得大致的时代定位。

其次是第8则。整理者称此句在传世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应的文字，<sup>⑱</sup>实际上《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所记孔子之言与该句极为接近，类似的表述见于其他战国时代的文献。现将相关文献罗列如下：<sup>⑲</sup>

仲尼曰：“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仲尼曰》）

孔子曰：“故佚诸取人，劳于治事；劳于取人，佚于治事。……”（《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

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墨子·尚贤上》）

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心一意，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管子·君臣上》）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慎子》）

明主之治世也，急于求人，弗独为也……君道知人，臣术知事。（《鹖冠子·道端》）

故君子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王霸》<sup>⑳</sup>）

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韩非子·难二》）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士节》）

此类表述除了见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这样的儒家著作，亦见于《墨子》这样的墨家著作，更多的则见于《管子》《慎子》《鹖冠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这样与黄老学说或稷下之学关系密切的著作，应是战国时代的普遍流行的观念。尽管《论语》中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之说，但并未涉及“劳”“逸”对立的观念。在君臣关系上，孔子强调的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的观念，是战国时代官僚体制建立、君臣分职理论完善之后的产物。<sup>㉑</sup>尤其在黄老文献中，君逸臣劳的观念体现得尤为明显。<sup>㉒</sup>值得注意的是，《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长篇大论的孔子语，已有学者指出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而是形成于战国中期或者之后，并可能受到《缙衣》的影响。<sup>㉓</sup>此外，该篇虽被

视作儒家文献,但文中的“察一”一词显然是有黄老色彩的,<sup>④</sup>“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统统塞耳,所以聿聪也”等语所反映的观念也近于黄老之学,因此《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可能吸收了黄老思想的一些因素。<sup>⑤</sup>《仲尼曰》或借鉴了类似于《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的文献,蕴含着黄老特色的君逸臣劳观念。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期,<sup>⑥</sup>具体而言是齐威王(前356-前321在位)兴办稷下学宫的时期。准此,《仲尼曰》的成篇应不早于齐威王时期。

再看第23则。该则谓若有人在水洑之岸跌倒,如若自己不出手救援,那么便是“唯心弗知而色为知之”,其言下之意是心为主导,如若心能感知到这一切,势必不会坐视不理。《论语》中“心”字共出现6次,都是一般心理活动意义上的用法,尚无心性论意义上的含义。<sup>⑦</sup>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孔子的阶段,人格的问题虽已觉醒,但身心关系却尚未成为重要的哲学问题。所以孔子不仅少谈‘心’,更没有触及‘身’与‘心’的关联”。<sup>⑧</sup>《仲尼曰》此则将“心”与“色”对举,凸显“心”对道德及行为的控制,已有一定的心性论意义,当晚于孔子的时代。且“心”“色”对举见于儒家后学著述,如《礼记·礼运》“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礼记·祭义》“结诸心,形诸色”,说明该则可能反映了儒家后学的观念。《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谓仁义礼智的德性根植于心,又反映于“色”,可与《仲尼曰》相参看。

从以上三则看,《仲尼曰》应掺入了一些战国时代儒家后学的言论,所谓“仲尼曰”不必完全视作孔子语,也未必反映春秋时代的儒家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仲尼曰》第1则在《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中被视作曾子之言,第10则在《礼记·大学》中亦被视作曾子之言,第7则见于《礼记·中庸》,《中庸》通常被视作子思的作品。<sup>⑨</sup>这些言论可能本出自孔子,后被儒家后学进一步发挥,也有可能只是儒家后学的言论,被冠以孔子的名号。事实上,战国秦汉时期依托孔子的文献大量存在。《仲尼曰》第7、10则

均围绕“慎独”展开,过去通常认为“慎独”观念源自子思,因此这两句是否果真出自孔子之口也值得怀疑。

可见,《仲尼曰》应是一种借鉴了其他儒家典籍的孔子言论摘编。《仲尼曰》所借鉴的材料,当包括据称出自子思的《缙衣》,也可能包括同样据称出自子思的《中庸》,以及据称出自曾子或子思的《大学》;<sup>⑩</sup>鉴于《论语》在安大简的时代当已编纂成书,<sup>⑪</sup>《仲尼曰》与《论语》体例相近,部分内容相关,《论语》很可能也是《仲尼曰》的重要资料来源;此外,《仲尼曰》的摘编者还参考了其他战国时代流传的孔子言论,《仲尼曰》之所以与《论语》《缙衣》《中庸》《大学》存在交集,未必是因为摘编者直接阅读了这些文献,也有可能是摘编者参考了当时收录同类语录的其他文献。战国时代的孔子言论通过不同的文献流传,并不断经过后人增饰与改编。上博简中有十余篇孔子语录,<sup>⑫</sup>或与《论语》《礼记》诸书存在交集,或是前所未知的佚篇,此类在楚地流传的孔子语录应该也是《仲尼曰》摘编者的借鉴对象。

## 二 《仲尼曰》的摘编取向

《仲尼曰》中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可说明《仲尼曰》的摘编取向:

其一为主题相对集中。《仲尼曰》25则看似内容驳杂,但仍有一定的主题偏好。《仲尼曰》中摘编者相对偏重且较为重要的主题有:(1)“言”与“行”,见于第1、3、6、19、24则,共5则,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20%;(2)“善”与“不善”,见于第10、15、17、21、22则,共5则,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20%;(3)“慎独”,见于7、10则。<sup>⑬</sup>前两个主题虽同样见于《论语》,但在《仲尼曰》中所占比例显然高于《论语》的相类论述,“慎独”的主题则不见于《论语》。而《论语》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仁”和“礼”,前者在《仲尼曰》中仅出现在三句之中(第4、6、11则),后者则未见。可见,《仲尼曰》有自身的主题选择,其侧重点与《论语》并不相同。

其二为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

式。《仲尼曰》所摘编的句子，往往蕴含前后对比的意味，如“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回，汝幸，汝有过，人不隐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汝有过，人弗疾也”“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务言而惰行，虽言不听；务行伐功，虽劳不闻”“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及”“以同异难，以异易”，等等，此类有前后对比、反差意味的句子，占《仲尼曰》全部内容的一半以上。对比的关系，涉及“君子”与“小人”的对比、<sup>③</sup>“古”与“今”的对比、<sup>④</sup>“善”与“不善”的对比、“仁”与“不仁”的对比<sup>⑤</sup>等。《仲尼曰》的摘编者似乎偏好句式齐整的语句，有的句子已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偶。

既然《仲尼曰》当自《论语》《缁衣》等早期儒家经典摘编而来，那么它与传世文献的差异便值得注意。《仲尼曰》较为简省，并不能说明《论语》诸书在此基础上加以润色修饰。更大的可能是，摘编者在摘录早期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偏好，如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对文本进行了改编。

如第2则。《礼记·缁衣》的“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在《仲尼曰》中作“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缁衣》的“亲”与“信”（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同），在《仲尼曰》中均作“信”。“贵”“贱”相对，谓语统一为“信”，当是刻意改编的结果。“大人”在《仲尼曰》中作“今人”，当与《仲尼曰》偏好“古”“今”对比有关。<sup>⑥</sup>《仲尼曰》无《缁衣》的“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一句，亦或是摘编者更注重“今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这样前后对比、句式齐整的文句，从而将其内容省略。

再如第12则。今本《论语》的“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在《仲尼曰》中作“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久狎”与“长敬”并举，对仗谨严，或出自摘

编者的改编。

再如第20则。今本《论语》多出前后两句“贤哉回也”，“回也不改其乐”一句亦多出语气词“也”，较《仲尼曰》的表述更显口语化，而更接近真正的“语录”。《论语》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的“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在《仲尼曰》中作“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论语》《孟子》的“不堪”“不改”，在《仲尼曰》中均作“不胜”，然“己不胜其乐”难以理解。徐在国、顾王乐两位学者指出，今本“回也不改其乐”之“乐”，应为颜回之所乐，而简本“己不胜其乐”是针对上文“人不胜其忧”而言的，意谓自己不能承受其“乐”，此“乐”应是指人之“乐”；《仲尼曰》的表述更为原始，《论语》的表述是经过润色的结果。<sup>⑦</sup>笔者则倾向于认为，今本《论语》的表达更为顺畅，“己不胜其乐”则不辞。“己不胜其乐”的“己”明显与“人”相对，很难将“己”等同于“人”。整理报告便将“己”理解为颜回，<sup>⑧</sup>但未作进一步解释。“不胜”即“不堪”，意为不能承受。“己不胜其乐”的字面意思指颜回自己不能承受快乐，但这在全句中难以说通。《仲尼曰》的摘编者可能为了句式、用词的齐整，将“不堪”“不改”一概统一为“不胜”（正如第2则将“不亲”统一为“不信”），从而导致了文义的混乱。这也是《仲尼曰》改编自其他古书的重要证明。

再如第21条，今本《论语》多出“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诸语，《仲尼曰》的其他表述亦较今本《论语》简省。在今本《论语》中，所举齐景公与伯夷、叔齐的例子与前文皆有呼应，在行文逻辑上较《仲尼曰》更为严密。《论语》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仲尼曰》中“见善如弗及，见不善如逄”，二句均为五字句，“及”“逄（及/袭）”均为缉部字，句式齐整，韵律和谐。有学者指出简文用韵，因而更有可能当是这句话的原貌，<sup>⑨</sup>但用韵也有可能是整齐化后的结果。关于“逄”，整理者提出两种意见，一是读作“袭”，二是读作“及”，并引《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的“见善恐不得与焉，见不善恐其及己

也”为证。<sup>⑩</sup>无论是读作“袭”还是读作“及”，<sup>⑪</sup>其宾语都应该是“己”，而《仲尼曰》此句缺乏宾语，文义不如《论语》及《曾子立事》的相应文句顺畅。

文句的整齐化，在《缙衣》等儒家后学著述中已有体现。如《论语·为政》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缙衣》中作“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缙衣》的句式更为整齐，有对偶的意味。已有学者指出，《缙衣》中的孔子之言，许多是“上位者应该保持的状态”以及“下位者应该保持的状态”并举的定型化句式。<sup>⑫</sup>因此，《仲尼曰》中的一些前后对比、句式齐整的内容，有的并不能肯定出自摘编者的改编，而可能是所摘编对象的固有表述。如“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与《论语》相同，“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的对偶关系也与《缙衣》相同。摘编者有意选择甚至有意改编此类语句，则可能受到《缙衣》等儒家后学著述文风的影响。

《仲尼曰》的材料来源虽然多元，却体现出追求文辞简省、用词一致、句式齐整以及前后对比的总体倾向，甚至因此出现文义不足的情况，恐怕并非偶然。《仲尼曰》虽是战国时代的写本，但该篇所记录的孔子言论，未必能反映更原始的面貌。与《仲尼曰》同出的《诗经·国风》，与今本《毛诗》相比，也表现出人为整齐、改编的迹象。<sup>⑬</sup>《仲尼曰》的摘编者主观改编的证据，还体现在第16则“喜怒不时，恒侮”与第25则“斂不斂，恒=侮人”的联系上。第25则的“斂”，整理者读作“夺”，训强取、夺取，<sup>⑭</sup>然文义难通。战国竹书中的“斂”多读作“说(悦)”，简文的“斂不斂”或可读作“悦，不悦”，“悦”与“不悦”很可能是分别对“喜”与“怒”的解释。<sup>⑮</sup>下半句的“恒侮”和“恒=侮人”又有对应关系。故第25则有可能是对第16则的解释或改编，这也是“斂不斂，恒=侮人”一句文义难通的原因。因此，《仲尼曰》所见“异文”，有的可能是摘编者诠释行为的产物。

文本在流传的过程中经传授者或抄写者主观改

编的现象，并不罕见。如通过竹书本《缙衣》与传世本《缙衣》的比对，可知《缙衣》中一些语句因不同的语法理解而发生改易。<sup>⑯</sup>《周易》《尚书》等经典在抄写的过程中，也会经历再诠释所带来的改动。<sup>⑰</sup>儒家后学在传述孔子言论时，本就存在改易措辞并加以发挥的倾向。<sup>⑱</sup>《仲尼曰》具有摘编性质，摘编者完全可能在摘编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主观因素。

《仲尼曰》作为一个摘编本，反映了摘编者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偏好。基于此，目前有关《仲尼曰》释文的一些争议也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如《仲尼曰》“己不胜其乐”等句的解释，如果承认《仲尼曰》存在改编的现象，可为理解文义的内在矛盾或缺漏提供新的视角。再如有学者对《仲尼曰》“华繁而实厚”中“厚”字的释读持怀疑态度，试图向传世文献靠拢而改读为“省”。<sup>⑲</sup>结合清华简《厚父》等文献所见字形，该字释作“厚”自然更优。如若明乎《仲尼曰》摘编者注重前后对比的旨趣（《仲尼曰》中只存在对比，不见明确的类比），那么“华繁而实厚”的天与“言多而行不足”的人形成对比无疑更符合《仲尼曰》摘编者的偏好。<sup>⑳</sup>再如“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一句，学者的释读尚有分歧，如果了解《仲尼曰》摘编者对前后对比内容的偏好，该句的内在逻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 三 余论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安大简《仲尼曰》应是一种儒家典籍（如《缙衣》）的摘编本，并经过了摘编者的改编。摘编者可能借鉴了《论语》的内容，没有证据表明《仲尼曰》是《论语》的早期版本或《论语》的材料来源。由于《仲尼曰》出现了一些儒家后学的思想观念，表明《仲尼曰》文本的形成相对较迟，且一些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孔子之言。同时，《仲尼曰》的摘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自身的偏好，如侧重“言”与“行”、“善”与“不善”、“慎独”等主题，并有意追求内容的前后对比与齐整的句式。《仲尼曰》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出入，亦当结合摘编者的摘编取向加以理解。

关于安大简的时代,整理者公布过“距今(1950年)约2280年”<sup>②</sup>和“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sup>③</sup>两种说法。根据完整的碳十四测年报告,<sup>④</sup>“距今(1950年)约2280年”只是碳十四年代,未经树轮校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距1950年2280年;公元前400—前350年之间则是经过树轮校正的、属于68.2%置信度的其中一组数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要采信95.4%置信度的数据,并且要兼取多组95.4%置信度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根据竹简的95.4%置信度数据,其年代从战国早期、中期到晚期皆有可能。而根据竹简所附漆皮的95.4%置信度数据,安大简的埋藏不早于公元前360年。安大简各篇的抄写年代自然可能存在差异,但结合战国中晚期的书籍随葬现象以及各批战国竹书的互见情况,安大简各篇的抄写年代早到战国早期的可能性不大,而更有可能是战国中期后段至战国晚期前段之间(大致在公元前340—前278年)的产物。前文对《仲尼曰》文本的分析可与此相验证——《仲尼曰》的成篇应不早于子思和齐威王,即在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在位之后。

无独有偶,2021年6月,湖北荆州王家咀M798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涉及《诗经·国风》《孔子曰》以及疑似乐谱这三种文献,其中前两种与安大简所见文献存在交集。王家咀楚简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布,目前仅有零星材料披露。<sup>⑤</sup>从初步披露的内容看,《孔子曰》与《仲尼曰》在体例、内容及用字习惯上都极为相近。<sup>⑥</sup>简文的部分章节见于今本《论语》,但内容不尽相同,发掘者认为不宜将《孔子曰》与《论语》视作同一书。少量章节不见于今本《论语》,而见于《礼记》《孟子》等其他典籍,此外也有未见于传世古书的内容。王家咀M798楚墓的时代属战国晚期前段。具体而言,由于荆州为楚王都之地,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被秦将白起攻陷,王家咀楚简的时代自然在此之前;<sup>⑦</sup>而据发掘者判断,该楚墓已进入战国晚期,<sup>⑧</sup>故大致在公元前300—278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安大简有《国风》,有《仲尼曰》,王家咀楚简同样有《国风》,有《孔子曰》,可见这是战

国时代楚地儒家经典的一种组合形式。这种组合形式共见于两批竹简,暗示安大简的埋藏年代应与王家咀楚简相去不远。由于王家咀楚简有较明确的考古学年代,其内容又与安大简存在交集,安大简的时代有望随着王家咀楚简的公布而进一步明晰。《仲尼曰》的部分内容共见于王家咀楚简,则这些孔子言论的定型当不晚于战国晚期前段。至于《仲尼曰》与《孔子曰》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仲尼曰》与《孔子曰》的发现表明,在战国时代,孔子言论的流传之多、之广都超出过去的认识。这两种文献皆书于楚简,它们是儒学在楚地流播的重要物证。它们保存了不少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孔子言论,反映了战国时人对孔子的推崇,同时也说明当时流行的孔子言论极为丰富。楚地的知识分子在研习儒家典籍的过程中,对孔子言论加以摘录和整理,同时也可能注入自己的理解。郭店简除了出有《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忠信之道》等儒家典籍,还出有摘录前贤格言的《语丛》,其中便有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语相近的句子,<sup>⑨</sup>当自《论语》或其他儒家典籍摘录而来。这也可以侧面验证当时楚地知识分子研习、摘录儒家典籍的风气。屈原赋以及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皆可见儒学影响的痕迹,<sup>⑩</sup>可反映战国中晚期楚地知识分子受儒家熏染之深。白起拔郢之前的二三十年间,楚文化的核心区分文鼎盛,郭店简、王家咀楚简等皆为明证,可惜随着秦军兵戈东指,江汉平原不复昔日楚韵风流。

## 附记

本文的写作得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支持。

本文初稿曾提交2022年8月1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儒家语录类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坊,得到与会学者的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代生先生的未刊稿《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初探》指出《仲尼曰》的内容来自对其他文献

的摘录,并存在君子与小人、善与不善、仁与不仁、言与行、古与今等主题,观点多与本文不谋而合。

贾连翔先生《明体与释读:安大简〈仲尼曰〉附记类文字综论》(提交“战国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论坛”,2022年11月19-20日)一文指出,《仲尼曰》在抄写过程中进行了两次用简的增补,它极可能是本篇书手(亦即摘编者)所作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摘抄本,现存25条语录或有不同的抄录来源,在摘编的过程不断累增而成。该文观点可与本文相参看。

另“子居”在《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上)》(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9月7日)中指出《仲尼曰》是战国后期、末期儒家或倾向于儒家的人从各处抄录来的片言只语,多数非孔子之言。该文与本文观点有相近之处,但具体认识以及对《仲尼曰》成篇时代的判断与本文有所不同。该文指出《仲尼曰》涉及同异之辨,是《仲尼曰》晚出的一个证据,可以参看。

#### 注释:

①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

②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③徐在国:《谈安大简〈仲尼〉的“造越”“蹠跋”》,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17日。

④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44楼,2022年8月22日。

⑤“今”,整理者释作“於”,有学者改释作“今”,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13楼,2022年8月16日;第45楼,2022年8月23日。可从。

⑥郭店简本及上博简本《缁衣》无此章。《仲尼曰》第2则与第3则的次序恰与《礼记·缁衣》中“大人不亲其所贤”章之后接“小人溺于水”章的次序相同,暗示战国时期的某个《缁衣》版本可能已经包含“小人溺于水”章。至少,“小人溺于水”章并非出自西汉时人的杜撰。

⑦整理者认为“諝”=“諛”=“言聿”与“言丝”的合文。但此说仍有可疑之处。从下文的“多言”看,“諝”=“諛”=“言聿”当表示少言或慎言。

⑧“隐”,简文作“堇”。关于《仲尼曰》4处“堇”的释读,学者多有异说。此从读“隐”之说,可参见陈民镇《安大简〈仲尼曰〉补说》,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9月5日。

⑨侯乃峰先生认为“不仁”之后的“不”系“而”的误字,见氏撰《安大简(二)〈仲尼曰〉札札一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20日。可从。

⑩整理者认为“易”下有重文号,单育辰先生指出所谓的重文号实际上为句读符号,见氏撰《安大简〈仲尼曰〉札记三则》,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19日。可从。

⑪“及”,简文写作“逵”,整理者提出读作“袭”和“及”两种说法。此暂从读“及”之说。

⑫整理者释文作“仅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侯乃峰等学者已指出当在“避难”之后断句,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33楼,2022年8月21日;第43楼,2022年8月22日。可从。

⑬整理者原释作“沟产”,理解为攻城之器械和战马。单育辰、侯乃峰等学者改释,读作“沟岸”,见单育辰《安大简〈仲尼曰〉札记三则》,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19日;侯乃峰《读安大简(二)〈仲尼曰〉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20日。可从。

⑭“崙諝”,整理者怀疑读作“论语”,另有学者提出“端语”“短语”等说法。当以读作“短语”近是。“仆快周恒”,整理者引李家浩先生说,读作“朴慧周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仆快周恒”四字与前文墨迹有别。其含义待考。

⑮《仲尼曰》中与传世文献互见的文句,除“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一句与《论语》所记相同,其他则均有出入。

⑯如第4则,《仲尼曰》少《论语·里仁》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二句,《论语·里仁》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仲尼曰》中作“造次、颠沛必于此”。《仲尼曰》与传世古书相比缺少某句,有可能是《仲尼曰》的摘编者有意简省,也有可能是固有的异文,如据《穀梁传》僖公二十三年范宁注引何休语,古本《论语》或本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一句。同样的,“造次、颠沛必于此”一句或是固有的异文,也可能自“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省并而来。总

来说,《仲尼曰》的摘编者极惜笔墨,这种总体的倾向应非偶然。

⑮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⑯黄德宽:《略说〈仲尼曰〉〈曹沫之陈〉的文献价值——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发布会上的发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2022年8月20日。

⑰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⑱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44楼,2022年8月22日。

⑲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⑳(汉)班固:《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5页。

㉑如《礼记》中《檀弓》《礼运》诸篇孔子言论的晚出性质,学者多有讨论,参见杜明德《〈礼记·檀弓〉中的孔子形象——兼论〈礼记·檀弓〉可能的成篇时代》,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8辑,济南:泰山出版社,2009年,第122—132页;龚敏《〈礼记·礼运〉篇的作者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㉒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4—186页。

㉓如《论语·八佾》记孔子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子罕》记孔子语:“衣赧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颜渊》记孔子语:“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㉔在《论语》中,子贡、曾子引《诗》曾称“《诗》云”,见于《学而》《泰伯》。在《论语》之外,则有《礼记》的《缁衣》《表记》《坊记》《檀弓》《礼运》诸篇,以及《吕氏春秋·求人》《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韩诗外传》《说苑·政理》等文献所见孔子以“《诗》云”或“《诗》曰”引入《诗》的记载。

㉕(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88页。

㉖(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卷30,《续修四库全书》第98册(经部·礼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9,《东塾读书记(外一种)》,上海:中西书

局,2012年,第130页;程元敏:《〈礼记·中庸·坊记·缁衣〉非出于〈子思子〉考》,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第27页。

㉗参见虞万里《上海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3—308页。

㉘廖群:《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春之卷。

㉙[日]末永高康撰,[日]佐藤将之监译:《郭店〈缁衣〉的形式和思维中的子思思想之特质》,《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4期。

㉚孔德立:《〈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

㉛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钱宾四先生全集(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199页。

㉜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

㉝孙德华:《子思生卒年新考》,《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㉞郭沂:《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㉟宋立林:《子思生卒及师承考述》,《人文论丛》2018年第1辑。

㊱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7页。

㊲已有学者做过总结,参见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赵耿昊《从“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看战国君道论的发展》,《新经济》2019年第5期。

㊳《荀子·君道》有类似的表述:“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佚于使之。”

㊴赵耿昊:《从“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看战国君道论的发展》,《新经济》2019年第5期。

㊵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稷下道家代表作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页。

㊶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27—129页。也有学者相信《子张问入官》是春秋晚期孔子言论的实录,见朱赞赞《〈大戴礼记〉所见“孔子遗说”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6—81页。

④参见王中江《〈凡物流形〉的“贵君”、“贵心”和“贵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丁四新《“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期。

④5孔门后学的一些著述，不无其他学派的痕迹。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融入了阴阳学说，参见陈荣捷《初期儒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4分，1976年。有学者认为上博简《民之父母》融入道家学说，参见[日]西山尚志《上博楚简〈民之父母〉的儒道融合》，《汉籍与汉学》2019年第1期。另有学者指出《礼记·檀弓》有道家、法家的痕迹，《礼记·礼运》融入道家与阴阳学说，见前揭杜明德、龚敏之文。

④6陈丽桂：《黄老思想要论》，《文史哲》2016年第6期。

④7杨少涵：《论孔子的“心学”》，《江淮论坛》2010年第4期。

④8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第45页。

④9(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13，第288页。

⑤0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

⑤1因据称子思所作的《坊记》出现《论语》的书名，故学者多认为《论语》在子思生前业已成书。参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66—267页。

⑤2[美]顾史考：《上博竹书孔子语录文献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

⑤3安大简未刊布的文献中，另有一种文献亦提及“慎独”，见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

⑤4如“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等句。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介绍，安大简未刊布的文献中，有一种以君子与小人比较，论君子之行为规范，指出“君子日自新，而小人日自厌”等，亦可参看。

⑤5如“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弗恶而杀之”等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披露另一种未刊文献，提及“古富今贫”“古治今乱”等。

⑤6如“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

⑤7另有学者指出，“今人”是更原始的表述，《缙衣》的“大人”则是改动的结果，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45楼，2022年8月23日。

⑤8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⑤9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50页。

⑥0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26楼，2022年8月21日。

⑥1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50页。

⑥2“袞”亦可训为“及”，《广雅·释诂一》：“袞，及也。”《楚辞·九歌·少司命》“芳菲菲兮袞予”，李善注：“袞，及也。”

⑥3伊東倫厚：《「礼記」坊記·表記·緇衣篇についていわゆる「子思子」残篇の再検討》，《東京支那學報》第15号，1969年6月。

⑥4李林芳：《〈毛诗〉较安大简〈诗经〉文本的存古之处——句式整齐性的视角》，《文史》2021年第1期。

⑥5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51页。

⑥6王宁先生便将“斂”读作“说(悦)”，但他认为“悦不悦”指该高兴的不高兴，是侮辱人的表现，与本文的理解有所不同。王氏还指出，第16则的“爻(悔)”字下应该是脱漏了重文符号=，读为“悔人”；第25则“亘(恒)”下的重文符号本来应该点在“爻(悔)”下的，“爻(悔)=”也应该读为“悔人”，抄手发现写错了，所以又在下面补写了个“人”。此说颇有道理。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第50楼，2022年8月28日。

⑥7沈培：《从语法角度看〈缙衣〉在流传过程中的改动》，《古文字研究》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09—418页；《再从语法角度看〈缙衣〉在流传过程中的改动》，《简帛》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7—121页。

⑥8[美]夏含夷：《重写儒家经典：谈谈在中国古代写本文化中抄写的诠释作用》，简帛网，2010年7月16日；《简论“阅读习惯”：以上博〈周易·卦卦〉为例》，《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5—394页。

⑥9李卓泓、陈剑：《〈礼运〉成篇时代刍议——兼说七十子及其后学著述风气》，《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2期。

⑦0见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下的跟帖，

第11楼,2022年5月2日。

⑦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仲尼曰》的“华繁而实厚”是更原始的说法,《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中的“华繁而实寡”系曾子所改;其二,孔子所言也是“华繁而实寡”,但《仲尼曰》的摘编者为了追求“华繁而实厚”与“言多而行不足”的对比的关系而将“寡”改作“厚”。

⑧黄德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

⑨《安徽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专家鉴定与座谈会纪要》,《汉语言文字研究》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⑩该报告承徐在国先生惠示,谨致谢忱。对照之下,可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所附“加速器质谱(AMS)14C测试年代表”的数据并不全。

⑪2022年5月10日,“江汉考古”微信公众号发布《湖北“六大”终评项目——荆州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一文,初步介绍了相关内容。2022年5月11日的2021年度“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来自荆州博物馆的赵晓斌先生曾做题为“和而不同——湖北荆州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的汇报。2022年6月11日,“荆州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发表《荆州王家咀楚墓出土竹简——孔子“吐槽”》一文,对《孔子曰》的内容有进一步介绍。

⑫《仲尼曰》第20则“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与《孔子曰》的表述如出一辙,王家咀楚简《国风·周南·汉广》的用字与今本《毛诗》不尽相同,但与安大简《汉广》相一致。安大简入藏于2015年,王家咀楚墓发掘于2021年。正如清华简《越公其事》可以得到后来发掘出土的枣纸简的验证,《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与《论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表述不同,却可得后出王家咀楚简的验证,安大简的可靠性自然可得更进一步证明。

⑬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东迁之后的战国晚期晚段,楚都纪南城附近地区虽然仍有少量承袭楚文化特色的楚遗民墓葬,但基本不再见有中等及以上级别的楚国贵族墓葬。参见徐少华《郭店一号楚墓年代析论》,《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⑭楚墓的战国中、晚期分界大致在公元前300年,参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⑮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第211—212页。

⑯陈民镇等:《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研究(上)》,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 On the Nature and Compilation of "Zhongni Yue" of Anda Manuscripts

Chen Minzhen

**Abstract:** "Zhongni Yue" of Anda Manuscripts provides a new version of sayings of Confucius in the pre-Qin period, which is an important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us' thoughts, the spread of Confucius' remar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Book of Rites* and *Kong Congzi*. "Zhongni Yue" should be a compil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adapted by the editor.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me ideas of Confucian in "Zhongni Yue" shows that the text of "Zhongni Yue" took shape relatively late, and some sentences are not really Confucius' remarks. The editors had their own preferences in content and form, such as focusing on the themes of "speech" and "action," "good" and "not good," and "keeping cautious when alone," and intentionally pursuing the comparison of content and neat sentence patterns.

**Key words:** Anda manuscripts; "Zhongni Yue";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anist